

## 中日蚕桑起源传说的比较

曹建南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中日两国都是以稻作、蚕桑为基础文化的民族。围绕稻作、蚕桑起源的神话传说及其传承,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两国关于蚕桑起源的传说应从谱系上进行比较,理清哪些传说是两国固有的,哪些是有传播、影响关系的,对后者还应进一步分析其情节、母题的异同,并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两国民族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 中日两国;蚕桑起源;神话;传说;谱系

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都是以稻作、蚕桑为基础文化的民族,稻作和蚕桑自古以来就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衣食之源”,因此,围绕稻作、蚕桑起源的神话传说,在中日两国的传承,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对中日两国的稻作、蚕桑起源传说的比较研究,日本的伊藤清史开了先河。他在《谷物起源神话的问题点》、《吐丝的女人——日本、中国养蚕起源传承的比较》以及《变成蚕的女人——养蚕起源故事的传播》等文中,对中日两国的有关稻作蚕桑起源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较详细的比较<sup>①</sup>。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伊藤的比较主要着眼于情节的类同、变化及与其他传说的复合,在通过情节的类同、变化、复合的比较分析中日两国的民俗文化的特点等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另外,伊藤对中国蚕桑起源传说的谱系的归纳,似乎也欠全面,不能反映中日两国历史社会及文化上的特点。例如,在《吐丝的女人》一文中,伊藤把中国的养蚕起源传说归纳为“高贵妇人始蚕型”和“尸体化生型”两个类型,显然忽略了反映中国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在蚕桑领域中为“各神其教”(鲁迅语)而不断争斗的产物——叙述某神通广大的神灵变化其身而为蚕、衣被天下的“化身化蚕”型传说。

因此,本文拟就中日两国关于蚕桑起源的传说从谱系上进行比较,理清哪些传说是两国固有的,哪些是有传播、影响关系的;对有传播、影响关系的传说故事,进一步分析其情

收稿日期:1999-10-15

作者简介:曹建南(1953-),男,江苏常州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节、母题的异同,并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探究中日两国民族文化的特点。

中国是蚕桑的发源地,自古以来,中国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蚕桑起源的神话传说故事。其中以晋·干宝撰《搜神记》所记录的蚕马神话最为古老,传播也最为普遍。

然而,如果我们从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及现代所采集的各地方的有关蚕桑起源的传说故事来分析的话,可以把这些传说故事的谱系作如下的分类。

第一类是帝王始蚕型,即叙述由帝王或地位近似于帝王的高贵夫人首创种桑养蚕的传说故事。

在这一类传说中,最著名的是黄帝元妃嫫祖创造蚕桑的传说。嫫祖始蚕之说,初见于宋·罗泌《路史》后记五,其文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以其始蚕,故祀先蚕。”先蚕,即养蚕的创始者。把嫫祖作为先蚕供奉,始于北周。事见《隋书》卷七《礼仪志》:

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嫔,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

在这以前的众多古代文献中,虽有涉及黄帝元妃嫫祖西陵氏的记载,但却都与蚕桑无涉。更使人觉得可疑的是,在北周祀嫫祖为先蚕之前,北齐曾把黄帝祀为先蚕。《隋书·礼仪志》曰:

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大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往上古追溯的话,就不难发现,从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关于祭祀蚕神的文字,如“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蚕示八牢,八月”,至《周礼·天官》以及《礼记》的《祭仪》、《月令》等所记载的皇后亲桑仪式中,均没有显示所祭蚕神为谁。正如元代王禛《农书》所指出的那样:“盖古者蚕祭皆无主名”。古代文献资料中,最初出现“先蚕”这一名词的,大概是《后汉书·礼仪志》。该书在记述永平二年三月所举行的仪式时说:

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

其后,晋武帝太康六年,在西郊建造了“高一丈,方二丈”的“先蚕坛”,皇后亲桑仪式的规模,十分盛大,《晋书》对这次仪式的记载亦可谓详尽,但所祠先蚕仍不知何名。直到《隋书·礼仪志》,才出现了上述祭黄帝轩辕氏为先蚕的记载。自北周改祀嫫祖为先蚕后,嫫祖便成了先蚕的同义词。

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追溯,我们可以认为,嫫祖始蚕,并非自上古传承而来的民间传说,而是统治阶级把文化的创造归功于帝王贵夫人的正统思想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供奉嫫祖的先蚕坛,是历代皇朝举行皇后亲桑这一宫廷仪式的场所;而遍布各地的先蚕庙,则是各级地方官府举行祭典的地方,一般蚕农“乡氓”只能敬而远之<sup>⑧</sup>。因此,现代民间文艺采风中所采集的嫫祖娘娘发明养蚕的故事,也应当是在北周以后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附会假托之说。<sup>⑨</sup>

帝王始蚕型的传说故事中,蚕丛始蚕之说也是颇有市场的。蚕丛始蚕,初见于前蜀·冯鑑《续事始》,该书在《蜀蚕市》条中引《仙传拾遗》曰:

蚕丛自立王蜀,教人蚕桑。

冯鑑所引《仙传拾遗》大概是后唐杜光庭撰。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的话,那么蜀王蚕

丛教人蚕桑的传说,大概也不是那么古老的,因为记述蚕丛事迹比较详细的汉代的《蜀王本纪》及晋代的《华阳国志》中,都没有蚕丛和种桑养蚕有关的记载。

汉代作为蚕神祭祀的还有“菀窳妇人”“寓氏公主”。相传为汉代卫宏所撰的《汉旧仪》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汉刘安《淮南万毕术》卷下也说:

二月上壬日,取道中土并华水和泥蚕屋四角则宜,蚕神名菀窳。

关于这个“寓氏公主”、“菀窳妇人”,《搜神记》解释说:“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菀窳妇人,先蚕者也”;宋·秦观《蚕书》云:“寓氏公主,盖蚕神也”,清·蒲松龄《农桑经》则曰:卧种之日,割鸡设酒,以祷先蚕寓氏公主之神,可见“菀窳妇人”和“寓氏公主”两者都是贵族妇人之始蚕者。关于“菀窳妇人”、“寓氏公主”的传说,文献没有记载,至后世,大概连名字也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当然也就无法采集到类似嫫祖那样的发明养蚕的故事了。

第二类是化身变蚕型,也就是叙述某个有神通法力的人自己变化为蚕,衣被天下的故事。这类传说故事是我国古代儒、佛、道三教在民间竞争“市场”的产物,佛教的马鸣菩萨本是印度高僧,佛教理论家,佛教诗人,以擅长辩论著称,与蚕桑没有丝毫的关系。大概是因为“蚕马同气”思想的影响,加上隋唐以来,马头娘传说被道教利用,蚕神马头娘亦被作为“九宫仙嫫”而供奉于道教的宫观,香火颇盛的缘故<sup>④</sup>,到宋代便出现了马鸣化蚕的佛教故事。宋·道原《景德传灯录》载:

师谓众曰,此大士者,昔为毗舍离国王。其国有一类人,如马裸露。王运神力分身为蚕,彼乃得衣。王后复生中印度,马人感恋悲鸣,因号马鸣焉。

类似的故事亦见于《阿婆缚抄》卷一一四。

宝林传云,昔天竺之境有一马国,人皆生毛,声悉如马。马鸣卉,曾作蚕虫出彼国、自口出丝,令人作衣。马人钦化,悉为悲鸣,故名马鸣。

这样的佛教故事,并非由印度传来,而是佛教为了树立自己的蚕神,以便在蚕桑业发达的地区获得更多的信徒,扩大香火时,利用中国民间“蚕马同气”的信仰而编造出来的,因此,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当然,作为蚕神的马鸣菩萨,在以后的民间信仰中,还必须经过一个由男神到女神的“变性”过程。关于蚕神马鸣菩萨信仰的源流及其“变性”过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就此打住。

道教除了把《搜神记》所记录的蚕马神话改编为叙述“九宫仙嫫”来历的仙话传说,收入《墟城集仙录》、《三洞群仙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鑑》、《铸鼎余闻》之类的道教经典中之外,还创造了玄名真人化蚕的道教故事。集道教经典之大成的《道藏》中有《太上说利益蚕王妙经》,叙灵宝天尊遣玄名真人化身为蚕,教民经络机织的故事。摘录如下:

尔时,灵宝天尊在净明国土马迹山中,与诸仙众及诸真人百千万众随从到赤明宫中大会议法。是时,众有一真人名曰月净,从座而起,端简前进上白天尊曰:“今见世间,人民苦乐不均,衣无所得,将何救济?”天尊悯其所请,乃遣玄名真人化身为蚕蛾,口吐其丝,与人收什,教经络机织,裁制为衣。……于是玄名真人告诸世人,其蚕蛾是我之身变化,悯见众生,饱寒困苦,故来救济。汝可精心虔敬,不得轻慢,将我抛弃。若生轻慢,当复困苦;若加

敬重,得获大富贵。

但是,这位化身变蚕的玄名真人,似乎并未能在民间信仰中取得一席之地,至今不过是躺在浩瀚的道教典籍中的一条书蠹而已。

宋·罗泌《路史》注,元·王祜《农书》,明·郎瑛《七修类稿》及清·魏崧《壹是纪始》都引《皇图要览》(或作《皇图要记》)曰:“伏羲化蚕”。《皇图要览》不知为何何人所撰,但从这四个字中,我们也能看出儒家在创立自己的蚕神上所作的努力。记叙伏羲事迹的以《易经》的《系辞传》为最早,其中不乏伏羲首创八卦,发明鱼网,教人渔猎的记述,后世,《王子年拾遗记》、《抱朴子》中也有同样的记述,均与蚕桑无关。因此,不难推测,伏羲化蚕之说,是儒教为创立自己的蚕神而假托于“作结绳为纲罟,以佃以渔”的儒教圣人伏羲的。

以上所述的化身变蚕型蚕桑起源传说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除伏羲化蚕没有具体情节外,佛教的马鸣菩萨,道教的玄名真人都是具有变化的神力的,他们既能化身变蚕,又能再变回原身。如《景德传灯录》中说马鸣菩萨“后复生中印度”,《太上说利益蚕王妙经》中也说玄名真人“此身变化之后,经余年岁,复归本身”。这种变化后能复归本身的说法,正是宗教传说故事的特征。

最后,第三个谱系是死体化生型,即叙述由死体化变为蚕的故事。蚕马故事便属于这一类型。中国的蚕马故事,经历了神话阶段,仙话阶段到现代民间故事阶段这样一个漫长的变化发展过程,至今仍在江南蚕桑地区流传着。<sup>⑤</sup>这样的蚕马故事,在流传变化过程中,虽然有的叙述蚕桑的起源(例如《搜神记》的《女化蚕》、浙江绍兴的《蚕的故事》<sup>⑥</sup>等),有的说明蚕神的来历(例如唐·孙颜《神女传》的《蚕女》、浙江萧山的《马鸣皇菩萨的诞生》<sup>⑦</sup>等),有的则解释一种习俗产生的原因(例如湖南花垣的《女儿虫的故事》<sup>⑧</sup>),主题多种多样,但蚕马故事的三个基本要素(马、女、蚕),及其三大基本母题(①马死剥皮,②马皮卷女而去,③马女化蚕)却保持不变。这种主题的多样性和情节的单一性,是中国蚕马故事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死体化生型的另一个类型是女性缢死体化蚕的故事。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以《养蚕的起源》为题,记录了乾城杨宏印讲述的一个故事。其梗概如下。

一寡妇孤苦伶仃,日夜哭泣感动了龙王。龙王派儿子变成蛤蟆去做寡妇的义子。寡妇把蛤蟆养大并为其娶了媳妇。媳妇因丈夫是蛤蟆而心中不悦想害其性命。一年多后,寨中举行歌会,蛤蟆脱下蛤蟆皮变成英俊少年前去参加,并专找自己的媳妇对歌。对歌一直对到五更天亮,分手时互送礼物。媳妇回家看见自己送给英俊少年的花丝带挂在帐子上,心知和她对歌的少年就是自己的蛤蟆丈夫。第二年,媳妇趁蛤蟆对歌时,把蛤蟆皮烧毁。蛤蟆回家见皮已烧毁,不能回龙宫去,一气之下走出门去。媳妇追赶到一三岔路口,丈夫已不知去向。便爬上大桑树眺望,亦不见踪影,怨怆自缢于桑树而死。死体腐烂生蛆,托梦给母亲,言此蛆如喂以桑叶,长大后能吐丝作茧,茧可缫丝织绸。自此人们才知养蚕。<sup>⑨</sup>

### 三

日本人民自古以来就开始从事蚕桑活动。《三国志·魏志》的《倭人传》说当时的日本人“种禾稻,织麻,蚕桑,缉绩,出细织缣绵。”当然,那时日本人的蚕织生产技术还只是处于极其原始的阶段,《日本书纪》中说:“口里含蚕得抽丝”,大概是把蚕茧含在嘴里进行抽丝

的。公元三世纪的日本应神时代,中国的“秦人”、“汉人”经朝鲜移居日本,带去了中国大陆的蚕桑机织技术。后来,应神天皇、雄略天皇曾分别派人到中国去聘请机织和缝纫的技工。被招请到日本的机织、缝纫的技工在日本被称为“汉织”、“吴织”、“兄媛”、“弟媛”,对促进日本的蚕织业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中日两国在蚕桑机织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日本的漫长的蚕桑生产历史过程中,民间也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关于蚕桑起源的传说故事。由于日本民俗学家的长期不懈的努力,这些传说故事大多被记录成文,为我们的分析、比较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日本的蚕桑起源传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是叙述筑波的蚕影山来历的金色姬的传说。茨城县筑波郡神郡村有个蚕影神社,是一个供奉蚕祖神的神社,绘有蚕神的挂轴右侧写有“大日本着船丰浦港、天竺旧仲国、金色姬”字样,下面以“蚕祖神之由来”为题介绍了金色姬的传说。梗概如下。

从前,天竺旧仲国的国王叫霖夷大王,皇后尧契夫人,有一个女儿叫金色姬。不幸皇后早逝,霖夷大王娶来后妃。后妃想杀害金色姬就把她扔到了狮子吼山,但狮子并不吃她;后妃又把她送到鹰群山,老鹰也不啄她,反而把她带回了家。第三次,后妃就把金色姬流放到海眼山,金色姬也没死。后妃没别的办法,就把她活埋在内宫的院子里。霖夷大王回来发现院子里发着金光,叫人挖掘才知道是金色姬被埋在地下。金色姬没死。霖夷大王这才知道金色姬并非凡人,于是就把她放在用桑树做的独木舟中漂到海里。独木舟漂过万里苍海,最后漂到常陆国(茨城县的古称)丰浦港。被渔人权大夫所救,但不久便急病而死。权大夫夫妇把尸体放入木箱,夜里梦见金色姬希望他们给她喂食。第二天打开木箱一看,金以姬的尸体已变成无数的小虫,便喂以桑叶。晚上又梦见金色姬告诉他们养蚕的方法。这就是日本养蚕的起源。<sup>[4]</sup>

金色姬的传说,永禄元年(公元1558年)抄本《戒言》中已有记录,其后,到江户时代《庭训往来抄》、《广益俗说辨》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作为现代的民间传说故事,在广岛县,山梨县、东京都等各地都曾采集到,是日本流传较广的蚕桑起源传说之一。日本蚕农,把蚕的四次休眠,用“狮子眠”、“老鹰眠”、“庭院眠”、“木船眠”等名称来称呼,以象征传说中金色姬所遭受的四次灾难。虽然,名称的顺序,根据地区的不同稍有差异,但不可否认,这个金色姬传说和日本蚕桑活动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是日本特有的蚕桑起源传说。

第二个类型即蚕马故事。日本的蚕马故事,是由中国传播而来的。但中国的蚕马故事在传入日本以后,在情节结构上完成了丰富多样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小姐和马的关系。中国的蚕马故事大多说立了功的马想按照约定的条件娶小姐为妻,但小姐却不愿给畜牲做老婆。而日本的蚕马故事中,却以叙述骏马和小姐互相恋爱,在马棚幽会,情同夫妻的为多。例如青森县八户市的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某地的员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一匹非常健壮的栗色雄马。马对小姐怀有爱慕之心,小姐也为马的健美所吸引。于是每日都去马棚和马幽会。这件事被员外知道后,员外非常恼火,就把马杀了,剥下马皮挂在路边的桑树上晒。小姐听说马被杀了,急忙赶来哭倒在马的尸体上。这时,突然天空乌云密布,一阵狂风吹来,马皮卷起小姐腾空飞去。员外请巫婆占卜姑娘去向。卜词说“请等到明年三月十六”。到了第二年三月十六,空中云丛里

掉下一个平时小姐使用的梳妆盒。员外便把那梳妆盒捡回了家。过了二十一天,梳妆盒里生出了面孔象马脸的一白一黑两条虫子。给它们吃桑叶,长大后那虫子结成了茧子。从此,人们才开始了养蚕。<sup>⑩</sup>

故事中的“三月十六日”,是因为在岩手县,青森县一带,从正月十六日到三月十六日之间,是祭祀蚕神“奥西拉萨玛”的时期。在此期间,由盲目的巫婆手持用桑树雕成的一对马头和人头的神像,走村窜户,唱“奥西拉萨玛”的祭文,祭文内容和上述故事大致相同。

第三个类型是缢女化蚕的故事。鹿儿岛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从前,有一小姑和哥嫂一起生活。一天,哥哥出海,小姑和嫂嫂去海边送行。哥哥的船远得看不见,嫂嫂对小姑说,爬到山上能看得更远,于是姑嫂二人爬上了山;嫂嫂又骗小姑爬上桑树,把小姑的长发系在桑树上便回家了。小姑便吊死在树上,变成了蚕,吃桑叶吐丝成茧。<sup>⑪</sup>

### 三

以上,我们分别对中国和日本的蚕桑起源传说作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这些传说可列表归纳如下:

传说类型	中 国	日 本
帝王始蚕型	嫫祖始蚕传说(《路史》) 菀麻始蚕传说(《搜神记》) 蚕从始蚕传说(《仙传拾遗》)	
变身化蚕型	伏羲化蚕传说(《皇图要览》) 马鸣化蚕传说(《景德传灯录》) 玄名化蚕传说(《太上说利益蚕王妙经》)	
尸体化蚕型	马女化蚕传说(《搜神记》等) 缢女化蚕传说(苗族传说)	马女化蚕传说(分布于全国各地) 缢女化蚕传说(奄美大岛传说) 金色姬传说(以茨城县为中心)

很明显,和中国的蚕桑起源传说的帝王始蚕型、变身化蚕型、尸体化蚕型三大系统相比,日本的蚕桑起源传说只有尸体化蚕型一个系统。帝王始蚕型的蚕桑起源传说,把文化的创造归功于古代帝王或和帝王同属于统治者的高贵夫人,这是出于把帝王及其高贵夫人神圣化的需要。变身化蚕型的传说的产生,则是中国历史上儒、佛、道三教之争在蚕桑领域的反映。在养蚕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蚕茧的丰歉非人力所能左右,蚕病的蔓延更非人力所能控制。蚕农唯一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便是对蚕神的祈求。于是,各教竞相建立各自的蚕神,创造了马鸣菩萨,玄名真人,甚至伏羲化身变蚕的传说。

如果说帝王始蚕型和变身化蚕型的传说是为了政治或宗教的目的的“创造”,那么尸体化生型的蚕桑起源传说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民间的产物。从《山海经·海外北经》所描述的“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搜神记》所记录的蚕马神语言“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以及湘西苗族和日本奄美大岛的缢女死体化蚕的传说,我们不难看出其间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基础。那就是野蚕从桑树上掉下来时,靠一根细丝悬吊于树间的光景,恰如人之缢死体。刘敬叔《异

苑》卷三《缢女》条云：

缢女，虫也。一名蚺。长寸许，头赤身黑，恒吐丝自悬。昔齐东郭姜既乱催杼之室，庆封杀其三子。姜亦自经。俗云此妇骸化为虫，故以缢女名虫。<sup>⑬</sup>

既然东郭姜的缢死体化生为蚺(蓑虫)，被名为缢女，那么，和蚺形体，习性相类似的野蚕被认为是缢死体所化，在民间思维中，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思维方式了。

日本神话中，蚕是神死后化生的。如《古事记》说谷物神大气津比卖被杀后，“头上生蚕，两眼生稻种，两耳生粟，鼻孔生小豆，阴部生麦，腔门生大豆”。《日本书纪》则说“保食神实已死矣，惟有其神之顶化为牛马，颊上生粟，眉上生蚕，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阴生麦及大小豆……”，日本的金色姬的传说、缢女化蚕的传说，和《记》、《纪》神话显然是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日本的马女化蚕的传说，即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蚕马故事，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关于传播途径，正如柳田国男曾经在《大白神考》里指出的那样，具有读解汉籍能力的日本知识人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sup>⑭</sup>。事实上，江户初期，日本的儒学者林罗山曾以《马头娘》为题，把蚕马故事译成日文，后收入《怪谈全书》中。到江户后期，蚕种商人上垣守国在其所著《养蚕秘录》中，也介绍了中国的蚕马故事。尤其是上垣守国，为推销蚕种，频繁往来于信州、关东、奥州、近江、山阴、山阳之间，和各地的蚕农接触的机会较多，因此，上垣守国在向日本蚕农推销蚕种，传授蚕桑技术的同时，很可能把中国的蚕马故事也传播到了日本的蚕农之间。如果说林罗山翻译的《马头娘》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江户时代的知识阶层的话，那么，精通和汉典籍的上垣守国在这一民间传说故事的传播上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蚕马故事，被干宝那样的知识人采集记录成文字后，经林罗山、上垣守国那样的“和魂汉才”的知识人、尤其是上垣守国那样深入民间的知识人的媒介，才溶入日本的民俗文化之中的。

主题多样、情节单一的中国蚕马故事流传到日本以后，在传承过程中，情节发生了多样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少女对马的态度不同。在中国民间的故事中，小姐都不齿与牲畜为婚，当马被“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时，小姐却“以足蹙之”并加以挖苦。而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本东北地区的蚕马故事中，则以叙述少女和马的恋爱之情，至少少女和马成了夫妻——日本学者给这类故事起名为“马娘婚姻谭”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的为多。也就是说，中国蚕马故事中的薄情小姐，在日本蚕马故事中变成了一个多情少女。这个变化，是同日本东北地区的传统的农家住房形式密切相关的。日本东北地区的“曲屋”，是一种平面图呈“L”形的住房形式，人和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蚕也养在这个屋檐下。家人围坐在围炉旁吃饭，马在一旁吃草，家人在一起说话时，马似乎也在在一旁侧耳倾听。因此，对于东北地区的农家来说，马不仅是用于农耕、搬运的家畜，同时也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家属”。在日本东北地区，照料马的工作，通常是由年轻的女儿或媳妇负责的，在有女劳力的家庭中，如果让男人用铡刀铡草喂马，那么，那家的女儿或媳妇将会受到邻里的嗤笑。不可否认，是农家的这种劳动分工，培养了日本农家少女对马的那种亲近的感情。这种对马的亲近感反映在民间故事里边，就形成了马和少女的恋爱、交婚的情节。日本东北地区并不是蚕桑发达的地区，但蚕马故事的流传却最为广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曲屋”的住房形式所构成的人(少女)、马、蚕共居的生活样式，以及由这种生活样式而产生的农家

女对马的亲深感在中国传来的蚕马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的缘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属于以稻作、蚕桑为基础的农业文化的国度,但由于两国的历史、宗教、民族心理以及民俗观念的不同,因此,两国的蚕桑起源传说,无论在类型体系上,还是在故事情节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统治者出于神化帝王、巩固统治的需要,把蚕桑的起源假托于黄帝、嫫祖及其他属于统治阶级的高贵夫人,于是就产生了帝王始蚕型的蚕桑起源传说。中国历史上的儒、佛、道三教之争,和化身变蚕型传说的形成,有着不言而喻的联系。这些历史、宗教的特点,都是日本所没有的,因此,帝王始蚕型和化身变蚕型的蚕桑起源传说就不可能产生于日本。同样,岛国日本的地理特征,又决定了金色姬传说那样的文化漂着型起源传说,只能产生并流传于日本的民间。而缙女化蚕型传说,由于是基于野蚕悬丝于树这样一个中日共同的生活经验的民间传说故事,因此,为两国所共有。另一方面,由于传播的作用而由中国传到日本的蚕马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了适合于日本民俗社会的需要的情节变化。民间的传说故事的比较研究,对分析中日两国民族文化的异同,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 注释:

①伊藤清司:《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所收,学生社,昭和54年。

②清·同治十三年刊《湖州府志》云:“嘉庆四年,抚浙中丞以浙西杭嘉湖三府,民重蚕桑,请建祠以答神贶。奏奉俞允,乃建庙于东岳宫左,曰蚕神庙。有司祭祀,乡氓虽瞻敬惟虔,而蚕时犹不敢褻祀先蚕,是小民知礼处。”可见地方官府的先蚕庙,一般蚕衣是不得“褻祀”的。

③如湖州采集的《先蚕嫫祖娘娘》即是一例,故事最后说:“明嘉靖四年,抚浙中以丞以浙西杭、嘉、湖三府人民重蚕桑,于是建庙在东岳宫(在今益民路),叫‘蚕神庙’,供奉嫫祖娘娘,相传庙内香火很盛。”(《湖州故事卷》,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30页)。显然系附会注②所引《湖州府志》之文字。

④隋·郎蔚之:《隋州郡图经》。(清·王谟《汉唐地理书抄》所辑,中华书局,1961年)。唐·孙颙《神女传》等。

⑤见《常州民间故事集》,(佳恩有限公司出版,1992年)、《杭州市故事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嘉兴市故事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湖州民间故事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

⑥亦我:《蚕的故事》,林兰编《渔夫的情人》,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⑦俞子豪:《马鸣皇菩萨的诞生》,《妇女与儿童》20—9,说明神话专号,1936年。

⑧龙秀祥、龙炳文:《苗女织蜀布做嫁衣的来历》,《楚风》1986年第6期。

⑨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50年。

⑩伊藤智夫:《缙》,法政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⑪《青森县昔话集成》,青森县儿童文学研究会编辑发行,昭和46年。

⑫山下欣一、有马英子:《久永ナオマツ姫の昔话》,日本放送出版协会,昭和48年。

⑬《学津讨原》(《百部丛书集成》本)。

⑭柳田国男:《大白神考》,《定本柳田国男集》12,筑摩书房,1963年,第278页。